



宋型文化与

宋代美学精神

刘方 著

K244.03
L612

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刘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 刘方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4.8
ISBN 7-80659-592-9

I . 宋 … II . 刘 … III . 美学 - 中国 - 宋代
IV . 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137 号

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刘 方 著

| | |
|------|---|
| 责任编辑 | 李 蓓 |
| 封面设计 | 文小牛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
| 版 本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
|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50×1168mm 1/32 |
| 印 张 | 12.625 |
| 字 数 | 24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7-80659-592-9 / B·90 |
| 定 价 | 2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 资助 特致谢忱



目 录

| | |
|------------------------------|---------|
| 导 论 宋型文化特征、宋代美学精神与研究方法 | (1) |
| 第一章 宋型文化的概念、分期与类型 | (16) |
| 第二章 宋型文化的内涵特征——精神内核 | (34) |
| 第三章 宋型文化的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 | |
| ——以科举制度为例 | (51) |
| 第四章 宋型文化的物质底层 | (73) |
| 第五章 危机中的拯救与承当 | |
| ——从唐五代信仰危机看宋代美学推崇审美人格成因 | |
| | (90) |
| 第六章 宋代美学对理想审美人格的重建 | (115) |
| 第七章 理想审美人格的典范建构 | (143) |
| 第八章 隐逸的两种类型 | (175) |

| | |
|------------------------------------|-------|
| 第九章 隐逸在宋代的转型及其对宋代美学精神的影响 | (193) |
| 第十章 隐逸与生命存在的精神自由与诗性栖居 | (215) |
| 第十一章 宋代文化转型与两宋禅宗美学的新特色与新发展 | (240) |
| 第十二章 从宗教禅到美学禅 | (249) |
| 第十三章 宋代禅宗美学的重要范畴与方法 | (284) |
| 第十四章 宋代文化转型与宋代绘画美学思想的新变 | (317) |
| 第十五章 从王维画的升格运动看宋代审美文化语境与审美观念 变迁 | (347) |
| 第十六章 宫廷绘画的娱乐化、制度化及其审美流变 | (374) |
| 后 记 | (399) |

导论 宋型文化特征、宋代美学精神与研究方法

在 20 世纪全球化趋势的文化语境下，从事中国美学的研究是有着极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新特性的。这不仅仅由于美学是一门源于西方的学科建构与学理体系，而且更在于有了西方美学他者的新维度与新观念的植入，这种研究就不仅是有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古今之争，而且产生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西方美学他者的存在，从事中国美学学术研究，从观念到方法，从研究思路到研究方向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型^①。

而身处 21 世纪新的文化与学术语境，我们还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文化与思想的处境。我们今天身处于各种理论、思潮、方法层出不穷的时代，因而，除了应当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必要站在更高的理论高度，来对学术研究的有些深层的问题，做必要的了解。而如果对这些理论和问题毫不了解，显然是闭目塞听的，就难免受到所谓“生盲大夫”之讥。因此，应当有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度和学术前沿的自觉意识。

除了美学领域的新理论与前沿问题之外，作为对于美学的历史研究，我们还不得不了解另一些理论问题：历史理论与历史观念问题。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

^① 刘方《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范型与方法的省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 年 1 期。

西方历史学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深深地渗透和影响到文学和历史的广泛研究之中。从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到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批评等等，无一不在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大显身手，让我们对于许多本以为熟知的文学史问题有了新的令人吃惊的发现，或者对原本熟悉的历史内容开始感到陌生，原本十分自信的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开始变得失去了自信甚至不理解。虽然我们并不是要对于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全盘接受，但是这些理论的确给我们长期以来已经比较定型，甚至僵化了的历史观念和学术研究方法，以革命性的冲击和震撼，激发和启迪我们重新认识、思考和理解许多文学现象、审美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关涉到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与历史现象的中国宋代美学的研究，对此一类理论、观念和问题，是无法充耳不闻和视而不见的。

处在今日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往中国美学研究在方法、范型、角度、范围乃至研究者的观念、思路、知识视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已逐渐暴露，如果依旧沿袭既有中国美学研究著述的路数，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有真正意义的较大突破与开拓。因而，基于对既有中国美学研究著述的全面检讨、思考、反省，重新确认与定位中国美学自身合法性及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审视现代知识型与现代美学思想范式这一前提，才能尝试在宋代美学研究上可能有较大的突破。这首先就需要在充分吸收、借鉴现代学术诸多领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新的研究观念、方法的前提下，将以往中国美学研究着眼于“是什么”的问题转向更深层的“为什么”和“如何是”等问题；将以往中国美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写法转向更为深广的文献与知识领域，广泛吸收诸多领域的成果，大大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与研究视野，特别是注意发掘那些在以往研究中，由于无条件运用西方美学“他者”眼光研究中国美学而压抑、遮蔽、忽略的思想，对宋代

美学进行创造性研究与表述。

一、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美学性质，在去蔽的前提下，重新阐述宋代美学

基于对中国美学研究问题的反思，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宋代美学研究对象作重新思考，并重新为宋代美学加以定位，我在他处提出“美学在其本源处，同人的生命处境与灵魂归宿息息相关，它展现了人对于人生意义、价值的寻求的特殊方式，它是努力使人从存在意义的晦暗不明之中，从存在的被遮蔽状态之中敞亮出来的本源之思、诗性之思，并在思的途中，感悟人生生命的意蕴所在，唤醒自己与他人，寻找一种生命的超越，从而使人生走向诗意的栖居”^①。这样的一种对于美学的新了解与定位，使我所进行的宋代美学研究建立于一个新的基点、依据之上。

如何在运用现代美学眼光透视宋代美学思想历史之时，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美学范式、采取西方美学“他者”眼光，从而能够真正把握住宋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清醒地意识到宋代美学所思考的美学核心问题与西方美学思想历史有着极大的区别，因而研究宋代美学应该注意去开启、敞亮、揭示那些被西方美学“他者”眼光所忽视、遗忘、遮蔽甚至压抑的宋代美学的固有思想（而这也恰恰是独特思想）便是一项重要的课题^②。

宋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转折时期，是宋代文化的突出体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宋代文化、历史、文学、哲学的研究有不少新的成果，“宋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但对宋代美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论文多限于对宋代美学理论文献本身的一些研究与分析，以及一些个案研究，所谓史的研究也

① 参刘方《生命的诗性之思：文化视野里的中国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版。

② 参刘方《现代建构中的承续与转换》，载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往往只是将这些孤立的理论研究，依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成。但是对于宋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文化发生，特别是宋代美学思想基本特征的形成、发展等与所处宋型文化之间的研究，则是一项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将中西美学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进行上下几千年的比较，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但是中西美学的历史上下几千年，空间上涉及众多民族与国家。将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某一理论的特征视为中国（或者西方）美学历史的一大特征，再与另一个同样得出的特征进行比较，不仅是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的，而且是缺乏可比性的。在中西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千古不变的思想、理论。任何一种理论、思想都必然是历史性的存在，并在历史中展开和变化，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存在。宋代美学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中，宋代美学有着它明显的独特特征。由于宋型文化这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转型的出现，使得宋代美学相应产生了深刻的裂变与转型。

宋代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型文化。中国传统美学在宋代也得到新的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长期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主体建构。宋代美学所反映和体现出的基本特征，宋代美学形成的新的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新发展与新贡献，也都正是在宋型文化这一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孕育下的产物。

宋型文化首先体现在完成了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的融合，并且形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思想。这一文化思想转型对宋代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其影响，宋代美学首先在理论思辨的总体水平上比唐代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受理学影响，中国传统儒家美学发展出了新的理论思想体系，即理学美学。同时，宋代美学从总体上体现出尚“理”和“理趣”化倾

向。另一方面，儒、道、释思想融合的完成，使宋代美学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新的内容：不仅产生了受禅宗思想影响的居士佛教美学（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而且产生了受到士大夫影响的禅宗思想大师的禅宗美学（以昭觉克勤、大慧宗杲、宏智正觉等为代表）。“以禅喻诗”成为普遍时尚，“悟”、“参”、“活法”等成为宋代美学中频繁出现的重要范畴，禅宗美学的影响在宋代美学中随处可见。而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不仅是一部具有现代审美型特征的开创性的重要理论著作（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问题，则严羽的《沧浪诗话》还可能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型美学理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影响以后数百年中国美学。而严羽美学思想的孕育、成熟，就鲜明体现了儒、道、释思想融合的特征。宋代美学研究的新的视角之一，就是在这种整体的历史文化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下，开创性地研究作为特定文化现象的美学思想是如何被具体地影响和孕育出来的。

宋型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新的特征，就是作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根本转型。寒门、庶族士子成为士大夫群体主体成分，并且成为宋代权利核心的主体成分。政治家、学者兼诗人（文学家）成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总体特征。这一具有平民文化与淑世精神的新的文化主体，使宋代美学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一方面作为平民文化折光的推崇平淡、平易的审美趣味的思想成为美学主流，使得宋代除初期之外，文学艺术基本没有出现华丽、绮靡的美学风尚。而作为政治家身份的影响，宋代美学被经世致用的观念笼罩，文道合一成为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共同要求，对品行、节操、人格的推重使审美人格理论和审美涵养工夫的理论发达。而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宋代士大夫的高度书卷化、书斋化，使宋代美学讲法度、讲精致，促使形式美学成熟。美学追求和趋向雅化，尚雅、尚清、尚逸、尚韵

等，同时也出现了与此形成对立的美学的俗化倾向：以俗为雅等等。因此宋代美学研究的另一个新的着眼点就应当是特别关注作为文化主体与文学艺术创造主体的宋代士大夫群体，关注和研究其日常生活、思想观念、文学艺术活动等，从而更深入、细致、具体地揭示宋代美学的基本特征与新变是如何成熟起来的。

具体而言，宋型文化对于宋代美学精神形成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伴随着宋代思想家在面临着自中唐以来的信仰危机，而对于终极依据的价值重建。伴随着宋代文化精神的向内在方面的转型，由传统的外在宇宙论本体向内在心性论本体的转型，宋代美学较之此前的中国传统美学，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迁与转型。特别突出地体现于宋代美学对于审美人格理论的普遍强调和审美人格实践的普遍要求。

宋代士人的人格类型自然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从其政治心态而言，则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是宋代士人，尤其是杰出精英们的一致追求。

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范仲淹在振兴士风上是一个突出的表率。朱熹一再推重他“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①，使得政治上的自断、自主、自信成为士大夫们的群体自觉。文莹《湘山野录·续录》“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条，记载范氏三次被贬，僚友们不畏干系三次设宴饯行，誉其为“此行极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其中有王质者，更与范“抵掌极论天下利病，留连惜别”。当有人警告他“将有党锢之事，君乃第一人也”时，王质奋然对云：“果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6页。

得覩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赢得了“士论”的热烈回应。范仲淹则以其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处世规范，及其人格精神，影响了整个宋代。《宋史》卷446《忠义传序》云：自范、欧等“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土人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成为其时土人精神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主导方面，其表现也就自然地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审美世界与美学思想中。

其次是宋代美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明显深化。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与事功建业统一起来，使人在内省修身中探索人之理，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达到个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谐融汇的美妙境界。这就从本体论上把人的伦理主体性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①。

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在天人之际的广阔宇宙空间，来寻找人的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而宋代思想家们也便在这样一种“究天人之际”的视野与思想境界下，来思考宇宙、社会、人生，思考美与艺术^②，因而，宋代美学精神与艺术特征，不仅诞生于

^① 参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牟宗三《宋明理学之课题》，载《道德理想的重建》，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刘方《“天人合一”的文化哲学话语的构成及美学影响》，载《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第八章，巴蜀书社，2003年版。

这样宏大的思想、知识、文化背景和土壤下，而且，也正是有了天人之际的宏大视野和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背景，才有了宋代美学特有的审美方式、审美思维、审美境界、审美理想与种种审美理论、观念、学说。

第三是三教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原始儒学偏重于从伦理理性来阐述经世致用之学，对天人之际的形而上方面关注比较少，未能从根本上解答人的生命本质等问题，因此也未能有效地与汉末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佛老之学相抗衡。宋学便积极汲取、整合佛道学说，以儒家学说为本位重建传统文化，给陷入困境的儒家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既力求在与佛道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中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又力求加强面临外侮内患的宋代社会的凝聚力^①。

宋代禅宗在哲学思想上已经逐渐缺少思想理论的原创力和新的理论建树，但是在宋代文化背景下，禅宗的发展体现出进一步世俗化的倾向，调和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并积极向儒学思想靠拢，加强与士大夫们的交游接触^②。甚至出现了佛徒士大夫化和文人居士化交互并现的普遍社会现象。释智圆与晁迥就是典型的例子^③。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到：“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④ 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而晁迥则说：“佛教本于名于情，佛教本于理于性。”（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一）这种处理“身”、“心”问题的原则，也是不少

① 参徐宏兴《思想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刘方《诗性栖居的冥思——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四、五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参陈寅恪《金明馆丛考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宋代文人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道教，在宋代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摆脱符象鬼神等怪诞诡谲之习和走火入魔的外丹炼养之风，转向内丹炼养的趋势日炽。内丹学更具有哲理的色彩。陈抟《无极图》、张伯端《悟真篇》等，都引向了人生课题，即探究生命的起源，关注本体的存亡。内炼成仙的丹法，乃是建基于天人合一论和归根返本论之上的，身内小天地的炼丹，取法于身外大天地的自然法则，以求在与物相忘中向自我本性回归，还虚归元，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①。

四是自中唐以来由白居易开启的中隐思想，到宋代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追求。唐代士子的汲汲于仕进、热切于功名，在宋代士大夫的眼中，受到鄙夷，而隐逸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内核的重要构成部分。

五是伴随着新兴的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宋代文化的普遍高涨，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理想也在艺术美学领域中产生了新变与转型。随着观念的变化，重新调整了的艺术眼光，重建了对于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功能理解。绘画中的文人画、墨戏等的产生，书法中的尚“趣”，对比唐人的尚法度，宋代的尚“趣”则鲜明体现了业余化、娱乐化特征。支撑颜真卿、柳公权的精神世界的是儒家成圣理想与道德人格，而支撑苏轼、黄庭坚精神世界的则除了这些精神内涵以外，还有了庄周的逍遥游的诗性生存精神与禅宗的随缘任运的旷达人生态度。

此外，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宋代城市发展并走向繁荣。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 10 万居民时，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 100 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 150 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

^① 参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在流通，印刷术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的贸易市场^①。这一切，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俗文化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与雅文化孕育的美学精神不同的俗文化所孕育的、新产生的审美趣味与美学精神。市民文化的勃兴，是为了适应城市中市民阶层的精神需要。这种市民文化，是一种新型文化。它的产生，不仅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内在变革，而且为以后明清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作为一种“文化美学”的宋代美学研究：理想范型与历史叙事

基于对宋代美学的基本认识，我认为，宋代美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美学”。这是基于对宋型文化、宋代美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宋代美学、宋型文化整体研究的研究范型，和对于宋代美学的历史如何表述和叙事的方法问题。

宋代美学研究的新的学术视角与理论意义，首先在于研究宋代美学和孕育这一思想的新的文化类型——宋型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进而研究在宋型文化多方面特征的影响下形成的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特征，以及对传统美学的新发展、新开拓等。而这一系列的研究，首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对于宋型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在本书中，我将宋型文化理解为一种文化范型，也是在这一

^① [美]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意义上，来使用宋型文化这一概念。宋型文化既然是一种类型、范型，其具体内涵与特征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举证式的解释，而应当是在库恩“范型”意义上和韦伯的“理想范型”意义上，对宋型文化作出整体的研究与规定。

库恩提出了著名的科学革命的“范型”（paradigm，或译“范式”、“典范”、“规范”）理论。库恩认为，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否形成一个为该门科学的研究者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范型。他认为从百家争鸣、诸说纷陈的前科学时期走向常规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一个范型。范型的作用就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这种信念一方面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范围，使研究者能把精力集中于一定范围；另一方面又为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这种范型主要是指由定律、学说、实验工具和方法所形成实际操作的具体范例（examples）。它并非一种单纯的理论框架，而是包括了理论、方法、实际操作并通过范例来体现出来^①。

而本书所研究的宋型文化的特征，必然要在对宋代历史文化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对宋代文化做通盘思考之后所欲达到的目标。自然，对于这样的目标，不敢抱有太高的奢望，比如揭示本质、发现规律一类。因为处于后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之下，深知这样的研究，也只能是在福柯所谓“权力的眼睛”中所看出的宋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一定程度上，必然地带有研究者本人的某些价值取向与理论预设，只期望能在尽可能占有详实与比较可信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谨慎地做出分析、阐释，而决不会以为宋代文化基本特征仅此而自欺。庄周先生早就教诲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

^① [美]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